

感受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 王国平

形象的本质属性。也可以说，他们都在创造着、实践着“科学家精神”。

全书厚植家国情怀。5位主人公都是在“时”与“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自觉将人生目标和生命追求，与民族、国家、时代紧密关联起来。比如，刘永坦出生于1936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之时。他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轰炸声中成长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他立下“做一个有担当的中国人”的誓言。卢永根1930年出生于香港，逃难中的饥饿感坚定了他日后投身农业、扑向大地的决心。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而深沉的信念感，以果敢和不屈直面困难、迎接风浪，又能甘坐冷板凳、潜心研究，力求“知行合一”，不断锤炼“择一事终一生”的专注品格。

知人论世是该书的一大写作特点，几位作者有意或无意突出“父亲”角色，强调“血缘”和“地缘”对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重要影响。陈俊武学习英语碰到困难，失声痛哭不肯上学，父亲递来一条毛巾，让他擦干眼泪，进而严肃告诫说：“人生就是要遇到无数难题，害怕退缩必将一事无成。”“赤脚少年”朱有勇下地干活，看到父亲辛勤劳作却时常遇到作物歉收，遂有了长大给土豆“治病”的念头。卢永根的父亲将“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的家训赠送给孩子。刘永坦的父亲跟他有一次正式谈话，沉痛诉说

当时国家正在蒙受的劫难，期待他能“为国家干点正事”。彭士禄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之子，他4岁时，父亲英勇就义。但在彭士禄的成长经历中，父亲始终是在场的在场。彭湃写下的“愿消天下苍生苦”的诗句，时常在彭士禄心中激荡。5位传主在父亲注视和期许的“目光”下长大成人，他们后来也成为父亲，接过赓续优良家风的接力棒。从美学象征上说，“父亲”是传统的象征，也是力量的象征。鲁迅先生1919年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声“诤问”响彻百余年，时时引发世人思考。《愿将此生长报国》以传记形式，不经意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应。

《愿将此生长报国》书写了“一类人”，突出了科学家的“共性”，同时也呈现出他们丰富而饱满的“个性”。几位作者不约而同从传主名字入手，来捕捉他们的个性。朱有勇在开拓事业的道路上“有勇”的一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卢永根名字里的“根”，关联他与祖国的土地紧紧相连。写彭士禄则通过对照的写法展现出“科学大师”和“邻家大爷”在一个人身上如何“和谐共存”。

“共性”和“个性”的交融，使《愿将此生长报国》成为一本了解科学家精神与情感世界的书，它也是一本有价值、有风格、有营养的书。

(据中青网)



浙江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愿将此生长报国》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共收录5位作者的5篇作品。该书聚焦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院士群体，展现他们的人生经历、事业成就、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读此书，仿佛上了一堂又一堂带有科普性质的“专业课”，蕴含哲理意味的“人生课”，具有引领作用的“思政课”。

书中的5位院士，分别是植物病理学专家朱有勇、雷达专家刘永坦、水稻遗传学家卢永根、炼油工程技术专家陈俊武和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从身份看，5位传主是“时代楷模”，是院士，这是“形”的部分。而他们情之所牵，心中所向，都浓缩在书名的“报国”二字上，这是“神”的范畴，是人物

文学家淘书之乐

□ 朱悦莹

买一套二手的外文版《荷尔德林全集》，花了一个月的饭钱。阿英遍访古籍旧书，他自诩道：“米星儿没一颗，菜根儿无一个。空把着几篇文章做什么？”“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薪资尚高的鲁迅亦感叹，“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郁达夫也觉得上海的西文旧籍价格实在昂贵，想到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同胞们，“则又觉我辈的买书，也是和资本家们的狂欢醉舞是同样的恶德了”。

通常来说，旧书摊比旧书店的旧书价格更低。对孙犁而言，读廉价书是野味的读书，印象深刻，乐趣也最大。解放战争时期，在河间县的集镇大街上，有推着独轮车卖旧纸的小贩，孙犁曾花很少的钱，买到了原版书《孽海花》。买罢他便在树下读起来，津津有味，其乐无穷。对汪曾祺而言，廉价书成本低，买得起，无须珍惜，丢了也不心疼。而且廉价书没有“板着脸孔的前言和啰嗦的后记”。让汪曾祺念念不忘的是，在上海一个中学任教时，一位叫“老许”的工友在校门外摆了一个“地摊”，用和烂纸差不多的价钱，他买到了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视若珍宝。矛盾也说，“一折八扣”书中有珍贵的书本，他的一位朋友就淘到了一册有英文注释的希腊古典名著。郁达夫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一折书粗制滥印，所翻印的书很少有新作品选本，内容贫乏，错乱。

旧书的品相、质量也千差万别。有一回，在中国书店，郑振铎偶遇店员打包残本《皇朝礼器图式》，装帧精美。他觉得这本书“衣冠之花纹、毛片，极为细密光致”，最后终于以三倍售价收购。孙犁就没那么幸运了。孙犁买过一部8套64册的《太平广记》。先不说装帧，单是纸张就不好，这部书用的黄色土纸。书面上也不干净，有很多之前阅书人做的圈点、批注。

买旧书，往往有淘书之乐。朱自清觉得，“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

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他自称嗜好买书，但对买书并不在行。戴望舒在《巴黎的书摊》中也写道：“跑跑旧书摊的人第一不要抱什么一定的目的，第二要有闲暇有耐心。”据戴望舒回忆，李健吾曾在法国一家旧书店淘到一部《塞果尔日记》，后来他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书摊也发现了同样一部书，装订更考究，价格却更低。

要想买到真正心仪的旧书，往往需要费一番功夫。阿英经验老到，几乎天天去中国书店的旧书市，他的藏书“全是东一本，西一本的从破书堆里淘出来的”。即便如此，阿英也有过买伪书的经历有一回，在北平文奎堂的书目上，他看到《萧碧堂集》续集出售，此前没听说过，以为发现了珍稀本，到手后才恍然大悟，这只是一部印刻低劣的明版翻印本。所谓续集，不过是《瓶花斋集》的易名。因此他感叹：“孜孜写作缘何事？烂额焦头为买书。”

嗜好旧书的人，自有好的书运。姜德明常以低价淘到意想不到的好书。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他以8角钱意外买到了刊物《弦上》的合订本，这本杂志是高长虹编过的，看过的人不多。后来鲁迅研究专家唐强、陈漱渝都借用过，高长虹文集印行时也专门借来复印。在中国书店的旧书门市部，他还买过一本《缪弘遗诗》，前面有李广田的序，只花了4角钱。

读旧书如遇故人。旧书上常遗留着前主人买书的印记，或题字，或题跋，或注释。张中行曾买过一本《彷徨》，扉页上有这本书之前主人所作的记录：“1939年4月24日买于北京西单商场，价4角。昔在通州有此书，乃李文珍女士所赠，记得为初版，此则为第13版。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情投而未意合，书则37年毁于战火。抚今思昔，为之惘然。”

旧书的流转见证了文学家们的文化生活与特有的时代印痕。他们与旧书之间的故事历久弥新，凝结在纸张上的旧时光，照耀着今天读者的心灵。(据光明网)



对爱买旧书的人来说，总免不了跑旧书店。叶灵凤认为，“每一个爱书的人，总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跑旧书店，“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自己的书斋中一样”。说起文学家最常去的旧书店，不得不提北京的琉璃厂。琉璃厂的古籍书店让叶灵凤记忆犹新，“从前人都说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店员记忆力好，对于汗牛充栋的架上藏书，只要一经过目，就能说出它的版本源流、优点和缺点”。他在这里买到了搜罗10年也缘铿一面的《无双谱》。有一回，他和阿英一同去买书，接待的店员没等他开口，就记得去年他买过《金陵丛刻》。

旧书摊也是淘旧书的好去处。不同的人，对旧书摊的印象迥然不同。在阿英的记忆里，上海城隍庙的书市曲径通幽，有各式各样的“地摊”“板摊”“小书铺”。他曾用10个铜子买了两部绝版书：《五四》和《天津事变》。在戴望舒的记忆里，巴黎塞纳河边的旧书摊别具诗意。在巴黎留学时，戴望舒常去那里漫步。他说，眼睛看倦了，腿也走乏了，这时候倚着栏杆，俯瞰塞纳河，那满载古愁的悠悠流水，缓缓归去，“倒也是一个经济而又有诗情的办法”。

不同的旧书，价格有高低之别。有些旧书价格高。为了买书，有人不惜节衣缩食。学生时代的叶灵凤穷得厉害，“有时连中午的一碗阳春面的钱也要欠一欠”，但跑旧书店却不惜花钱。季羡林为购



《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



作者：皇甫峥 汪林峰 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设立总理衙门、镇压太平天国不久之后，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支调查与外交使团。1875年，清廷任命了第一任驻美、驻英公使，正式开启清廷外交。到1895年，清廷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12个公使馆、12个领事处的海外办事处网络。清廷的使团和公使所作的信件、日记、报告、建筑和奏折几乎触及了清帝国外交关系的方方面面，也改变了清帝国外交政策及其对世界的看法。

本书讲述的是中国第一批前往西方的使节和外交官的故事，他们包括斌椿、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中，他们通常被淹没在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阴影之下。汉学家周锡瑞在序言中指出，他们是康、梁前一代试图理解西方的中国人，但与康、梁一代不同，他们无法借助日本人的翻译来理解诸如经济、政治、社会等西方概念，而是需要通过自己的体验、自己发明的术语来描述他们所观察到的西方世界。周锡瑞认为，“本书代表了新一代晚清学术的最杰出的方面。”

《猫鱼》



作者：陈冲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内容简介：在上海话里，“猫鱼”指的是在菜市场出售的一种本该漏网的小鱼，用以喂猫，沪语发音“毛鱼”。随着猫粮的出现，猫鱼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但是陈冲还记得它，对她来说，猫鱼是生命里转瞬即逝的灵感、人的本性里被遗忘或隐藏的真相，也是日常生活体验的每一个奇迹。

《猫鱼》是电影人陈冲的自传性散文作品，她在书中写着祖辈与母亲的故事，住在上海平江路老房子的岁月，独自踏上异国留学之旅，以及拍摄《小花》《末代皇帝》《意》《太阳照常升起》等作品的台前幕后，既是回忆录，也是知识人的心灵史和当代女性的成长之书。这部作品获得了《收获》文学榜长篇非虚构奖，评语称，这本书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独特又深沉的陈冲，她以克制内敛的笔法向家族历史征进，踏进如烟的往事却不沉溺其中，呈现出一种沉郁悲悯的气质。

《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



作者：宋明蔚

出版社：单读·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宋明蔚曾任《户外探险》杂志执行主编，也是极限运动家、传奇攀岩家汤米·考德威尔《攀岩人生：自我超越的力量》的译者之一。《比山更高》是他写作的第一本作品。本书书名中的“自由攀登”，是指在攀登过程中不借助任何器械之力，单纯依靠登山者自身的能力完成一条攀登路线。在中国，从事这一运动的不过数百人，死亡率却非常高。

宋明蔚本身是一位登山爱好者，有着长达14年的在场和观察经验，后来又花费三年时间进行采访、调查，写出了20年间一代代登山者的故事。和那种热衷于攀登珠峰的企业家与精英阶层不同，自由攀登者并不是那种沿着成熟路线十拿九稳地“拿下珠峰”的人，“他们甚至不想去爬那座世界最高峰，因为在川西的邛崃山、横断山、新疆的天山，西藏的念青唐古拉山，乃至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大量的未登峰等着他们去开辟。”他们是更愿意体验攀登过程中的快乐、自由以及攀登美学的人。宋明蔚试图描述他们的生命处境，并探究背后的故事和文化。

长篇小说《大河赤子》：为治河英雄立传

——读李恒昌《大河赤子》

□ 赵德发

海口，确保渤海市和利华油田安全发展的故事。阅读作品的过程，也是大河治理不断“解谜”的过程。譬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为何会有一个静若止水“无潮点”？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百年大槐树如何能得到有效保护？原来经常迁徙变化没有“家”的黄河口，怎样才能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家”？黄河滩区迁建为何一定要改变原来的“房台”，筑一个“大村台”？这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在长篇小说《大河赤子》中都能找到答案。透过这一作品，读者可以窥见黄河水利部门和沿黄人民治理洪患、调水调沙、滩区迁建、脱贫攻坚的奋斗画卷。

《大河赤子》成功塑造了从地方政府、油田到基层农村的各色人物形象，他们一个个有血有肉，立体丰满，栩栩如生，既体现着黄河儿女的自身特质，又富有崭新的时代精神。尤其是主人公张五魁，这位出生于黄河岸边“掉河村”的“河之子”，在黄河哺育下成长，逐渐成为一名优秀领导干部。他那“黄河不留骂名，咱也不留骂名”的誓言，“稳不住黄河口誓不罢休”的精神，为了创新方案敢于直闯领导办公室的胆量，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黄河职工王长河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人物。他不仅是黄河抢险专家，还擅长“黄河号子”，是黄河民间文

化的传人。在稳定黄河口的战场上，他身患重病依然来到现场，黄河口最终稳住了，自己却永远离开了人间。张五魁的塑造也很有特色，是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典型。他原本是槐树庄建筑队的队长，一心想着发财致富，然而，在生活的教育、大哥的引导下，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转而积极投身“黄河滩区”迁建，帮助全村人共同致富。这些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勇气与担当、坚韧与智慧，感人至深。

《大河赤子》在结构上颇具匠心。作品的多条线索交叉推进，互相辉映。一是主人公带领一班人治理黄河口的线索；二是主人公逐步成长的线索；三是其家人保护百年大槐树的线索；四是推进黄河滩区迁建的线索。作者将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两大主题有机融入这几条线索之中，更有利于突出时代主题。

李恒昌对黄河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据我所知，他所在的铁道战备舟桥处，坐落在黄河北岸，承担黄河铁路大桥的保障任务。多年来，耳濡目染的黄河故事，深深感动了他，才有了他视黄河为精神家园和文学故乡的情怀，才有了“大河系列”作品的问世。

(据人民网)